

万历五十年

胡月伟

钱法成
姚博初 著

学林出版社

上册



万历五十年

胡月伟

钱法成
姚博初 著

上
册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历五十年 / 胡月伟, 钱法成, 姚博初编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5.1

ISBN 7-80668-842-0

I. 万... II. ①胡... ②钱... ③姚... III. 历史事
件—中国—万历(1573~1620) IV. K248.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5931号

万历五十年(上、下册)



作 者——胡月伟 钱法成 姚博初

特约编辑——胡月明

责任编辑——周清霖

封面设计——周剑峰

责任监制——应黎声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 × 1240 1/32

印 张——28.75

字 数——73万

版 次——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6000册

书 号——ISBN 7-80668-842-0/K · 50

定 价——(上、下册) 48.00元

作者简介

胡月伟 上海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浙江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浙江省电影文学学会会长，浙江省戏剧影视创作中心主任，国家一级编剧，浙江传媒学院客座教授，杭州胡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疯狂的节日》、《疯狂的上海》、《疯狂的末日》、《最高级叛逃》、《大赢家》、《财富时代》；故事片《满洲虎行动》、《远东间谍战》、《迷途英雄》、《网络惊梦》、建党80周年优秀献礼影片《彩练当空舞》等十二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绍兴师爷》总编剧，“十六大”献礼剧、长篇电视连续剧《奔腾向海洋》编剧、四十集电视连续剧《万历五十年》总编剧。

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疯狂的节日》获《当代》优秀长篇小说奖，并出版日译本，风靡海内外。其作品视野开阔、雄浑大气。是当代文坛擅长驾驭重大政治、历史、财经题材的小说家，著名影视剧作家。

钱法成 浙江嵊州人。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省诗词学会会长，著名剧作家、书法家。与人合作戏曲故事片：《胭脂扣》、《西施泪》，绍剧《于谦》、京剧《南屏晚钟》，系电视连续剧《绍兴师爷》编剧。曾获文化部优秀剧本奖。

姚博初 女，浙江桐乡人。浙江省湖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剧作家。代表作有戏曲故事片《唐伯虎落第》，越剧《男人不在家》、《借纱帽》和《三指谜》等。出版有《姚博初剧作选》。曾获田汉戏剧奖·剧本奖。



序

凝视一个王朝逝去的背影

明、清两代的历史命运，备受作家关注。这是因为，明、清鼎盛之际社会矛盾和文化纠葛复杂尖锐，沧桑之变，似在瞬间。这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和文化转型有许多脉息呼应之处。《万历五十年》也是一部站在今天变革的历史维度，审查亡明之际历史变化、人物心迹的作品；然而与众不同的是，《万年五十年》在完成历史重构时以“大历史”的观念来指导、维系艺术再现的全过程，使得这部作品具备了有异于以往类似作品的品格。

作者从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特征入手，把整个封建社会末期的抽象特质放在一个共时性的长隧道中来考量。作者在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晚明社会“夹层式”的结构：在以“道德”治天下、以文牍传达中央意见的制度中，大而无当的文官体系组成上层统治集团；下层为缺乏有效组织的千万民众；中间是没有涉及经济、法律和人权的组织原则——道德，具体地说就是尊卑男女老幼之序。这些维系政权的因素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而且均是以保护落后的旧式农村习惯及结构为其准则，因而导致中央集权无可控制，技术改造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低效低能。明末的这种状况虽去亡清的鸦片战争二百五十年之久，但症结特质却如出一辙。两者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极其相似。由此察之，则封建的灭败不在清，而在于明。光绪、宣统的悲剧与万历、崇祯也是一脉相承的，都逃不出长隧道内的观感。作者认为，历史上有长期性的重大变革，往往牵涉很多方面，是很难以少数人的贤愚得失来概括的。其背面、侧面，必然有我们难以看清的因素。历史小说创作必须描绘真实的历史事件，反映人物的贤愚得失，这是显微简易式的观察；



序



序

更应捕捉历史的内在规律性,将短时间内不能看清的现象放在一个人的背景下去多方考量,即取一种望远镜式的视角。这就是作者“大历史”观的理论要义。

大历史观的观念首先在选材立意上表现出来。

明代中后期的历史纷繁复杂:社党之争,厂卫喋血,红丸疑案,农民起义……不同作者有不同兴趣。而《万历五十年》的作者认为,从社会结构的典型性来讲,最具价值的不是以“万历新政”为时空中心的社会形态、矛盾的展示,因为这一段十六世纪末中国社会的传统历史背景,浓缩了中国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回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我们看到,对万历王朝的聚焦,实质上是对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从事件上来看,“万历新政”、“储位之争”、“红丸疑案”等事件都以失败告终。主要人物,包括万历皇帝朱翊钧、首辅张居正、大学士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即便是次要人物,如大伴冯保、宦官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能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之故,因而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交祸。归纳大失败的原因,作者并非一味坚信过去明史中关于“税重民穷”的说法,而是从根本的社会结构入手,揭示出固有的社会结构已经难以承担新的社会发展需要这个因由,并进一步指出,用以维系王朝上下层结构的“以道德代法律”的做法,到万历年间已经走到了无以复加的极端。为了让读者能够了解这一观点,作者在情节安排上,着重推出了“万历新政”和“储位之争”两大事件。

万历新政的失败,主要印证了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严重脱节,以及大而无当的上层统治结构间混乱的官僚斗争。作品对变法过程的描述,是在对“权力”的争夺中拉开序幕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以权力持有者的需要为中心,直接或间接地张扬权力,维护权



力，因此，不论是帝王的鼎故革新，还是大臣的守成有功；不论是惊天动地的农民革命，还是刚勇义烈的变法图强，他们都只能在权力支配下运作。小说开篇将张居正和高拱不见刀兵的政权争夺战描写得扣人心弦，一开场就给全书制造了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氛围，并把读者自然地引领到明末上层结构的复杂关系中去。万历帝新即皇位，欲做英主，对张居正言听计从，终于拉开了新政的序幕，然而，明朝固有的社会结构在此时却显现出虽腐朽而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一种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制度，它不着眼于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国家的财富，而是力图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护王朝的安全。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不仅是与实际的生产发展需要脱轨，更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成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以张居正为主导的“万历新政”原本是对这种落后制度的匡正，但是当旧制度特别是庞大的统治层正在享受旧制度所带来的利益时，新生的进步力量便难以逃脱毁灭的下场。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新政代表张居正与整个文官集团不可调和的冲突。虽然这些冲突在青年万历帝革故鼎新的雄心下，在张居正的“铁腕政策”中一一获得了解决，但张居正却因此与整个文官组成的统治集团成为对立面，直接导致了最终的悲惨结局。以律法为中心的变法遭到了以道德和文牍为要义的制度的抵抗和反击。这是历史人物间的较量，更是两种意识形态间的激烈冲突。

小说有关万历帝立储之争的描写与处理，是作品后半部的重心，更进一步揭示了上层结构之间因为缺乏法律维系而造成的种种矛盾斗争。根据王朝祖宗的规矩，立长不立幼。不幸的是，皇长子常洛并非万历帝所爱，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常洵才是万历帝心中的太子之选。这一决定无疑又与整个王朝以“道德”立身的准则发生了大的冲突，尽管一方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但“失德”的罪名使贵为天子的万历帝也不得不以拖延时间、消极抵抗到最后妥协来了结纠纷。因为有了高层建筑的主导思想，小说才使纷繁复杂的君臣斗争、权臣之间的斗争以及后宫嫔妃、宦官之间的斗争有了可以倚靠的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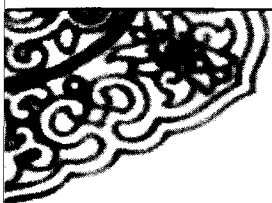
晰主线，万历帝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也得以树立。

无论是对万历新政纵深式的描绘还是对立储斗争的全景式展现，作者对历史的反思超出了直接的见闻而上升到知性的水平。这种在一个抽象的观念的引导下对历史资料进行分析、概括和整理的过程，即是黑格尔所期望的“哲学的历史”的境界，也是《万历五十年》一书历史重构的迷人之处。

如果说在主题上，《万历五十年》是对一个大失败的全面展现，那么这整个大失败则是由无数个人和社会的悲剧性历史所构成的。

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维加有一句名言：悲剧以历史作为它的主题。普列汉诺夫在论及历史悲剧时曾指出：“真正的悲剧以历史的必然性的观念作基础”。在《万历五十年》的文学营构中，最为鲜明可取的特点，就是能通过人物，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整个社会结构倾颓的悲剧必然性。作者通过潜心研究历史资料，考证历史事实，洞悉历史“悲剧”的演变过程，从而揭示产生悲剧的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发生悲剧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张居正的悲剧正是小说着力塑造的一个改革先驱者的悲剧，同时也是一个“性格”悲剧。从结局看，张居正去世后被夺官抄家，他是整个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的失败者，但从历史进程分析，张作为革新力量的象征，他与整个文官集团的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新生事物在新旧较量中遭到了扼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张居正的改革措施极大地触及了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雷厉风行的“万历新政”确实是衰落帝国的一支“强心针”，然而当药力触及了固有经济、秩序的同时，所有的人都成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家的对立面。万历帝对张居正又敬又畏，他既要依仗张居正来整治朝纲，又对张居正的高压怀恨在心；官僚们不但因为新政丧失了侵占的土地，被迫纳税，断了巨大的经济来源，而且因为张居正主持的“京察”而人人自危。



对大批面临停职降级的文官而言，首辅的做法令他们寒心，于是他们更要形成一股合力，作为自保的必要手段。当所有矛头齐指向一个代表了相悖利益的个人时，悲剧的结局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在悲剧现象背后隐藏了这样一个事实：改革最大的敌人并非来自单纯意义上的反对派，而是来自旧秩序倾颓前不可避免的毁灭性震荡。正如大厦之将倾，埋葬的不仅是张居正一人，而且是整个王朝中所有的秩序。张居正及其追随者败北的命运不是被历史偶然选中的，而首先是一种社会性悲剧无意识的产物。

作者以浓重的笔墨精心揭示了张居正的性格命运悲剧。一方面，作为官僚张居正，身为两朝元老首辅大臣，既是万历新政的主创者，也是“士大夫”群中享有最高地位的统治阶级；不过，这种角色定位已经被法国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阐释得非常精当：他们是“统治阶级被统治的一部分。”张居正因为学识和能力，一跃而成为“统治阶级”，又因为赋予他这种地位的可以依仗的力量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而又沦为“被统治阶级”。张居正选择了“为帝王用”作为终身恪守的道德准则，在单向的政治入仕选择中，张居正几乎毫不保留地将一生寄寓在政治权力之上，即使是充满个人智慧的变法，也没有摆脱政治权力中心控制的勇气，个体的才情和探索精神是用于为帝王家效忠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作为雷厉风行的改革家，张居正像所有“干吏”一样，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和精明干练的“铁腕”。为了实现理想，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力挽狂澜，不惜以身家性命来交换新政的推行。他极度自信，甚至不能谦虚谨慎，忽视了帝王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和朝臣与日俱增的不满，乃至将其赖以生存的整个官僚体制硬生生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官僚张居正的命运是要将自己纳入体制之中，而改革家张居正则因为“强极则倾”的个性特质，把自己推到了体制之外。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察到对人物身上这组矛盾的刻画。

张居正正是看到了政局的溃败、体制的缺陷而断然决定要改革流弊。在小说第一章中他曾因为冯保的一句承诺“事成之后，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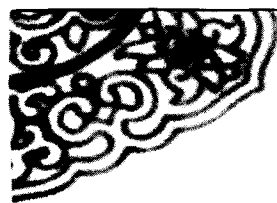
序



放手做心中所想”而毅然加入到与高拱的政权争夺中去，说明张居正确实是奇崛不世之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然而把自己纳入“被统治的统治阶级中”，使他的命运仍然操控在帝王的喜好之中，最终以雄才大略殉昏聩末世之主。“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是海瑞对其务实的评价，也同时概括了张居正命运悲剧的因由。

在对这类“被统治的统治阶级”的描写中，还有群像式的悲剧性人物塑造。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王锡爵、邹元标等等大小官吏，其命运无不令人慨叹。比如张居正的后任之一申时行。如果说张居正的性格是“强极则倾”的话，那么申时行恰恰相反，显得温和谦让和老成持重。他胸中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他懂得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全在于它能否与上层官僚集团共同的习惯相安无事。申时行没有崇尚武力的趋向，也没有张居正改造社会的宏愿，他的宗旨在于调停同一阶层之间和上下阶层之间的矛盾；然而这样的温和谦让却也没能使他在政治风浪中置身事外。在各种争端中，他进退维谷，被群臣讽为“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无能宰相”，不得不在年富力强之际提出辞呈十一次才获准退休。海瑞是恪守个人道德的模范官僚，直言犯险的诤臣。他和张居正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以个人来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上下求索；两人的不同之处是，张居正是在变革体制，海瑞的做法是力图回到先祖拟定的旧制度中去，使苛刻的政令有成典和理论依据。这两种殊途同归的精神指向决定了海瑞与张居正之间复杂的关系：既斗争又惺惺相惜；但是，在命运的走向上，海瑞和张居正一样，难以以个人的节操道德挽回王朝的倾颓之势。

这一干悲剧性官僚形象的塑造揭示了“士”的精神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尴尬境遇，也让我们窥探到了历史人物真实的精神世界。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是依附在专制主义机制上的一种奇特的亚政治文化，它使人们在复杂野蛮的人际关系中相互消耗，使政府行政在低效和腐化中丧失生命力。”张居正的干练、申时行的中庸、海瑞的清廉，这些原本十分有利于巩固政权的品性，



终于在封建制度的最后一站消失殆尽了。

在末代臣僚的群像刻画之外，作品还有另一条人物线，那就是对帝王形象的塑造。作品不是从文治武功、得失荣辱入手，而是以“人性”的角度来对君王加以考量的。小说要表现一段颓废异化的社会图景，就先表现其统治者被“异化”的人性。万历帝在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人失去了相爱和友善的能力及其结果绝望、丧失信心以及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从而使人到性生活、乖戾反常、麻醉剂和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中去寻求安慰。万历帝是一个刚愎自用、荒淫蛮横的帝王形象，又是一个举动乖张、空虚孤独的“人”化典型。作为一个帝王，幼年起被紫禁城高大、冷漠建筑群封闭的经验使他的心灵空间失去了任何装饰性，作为儿童应有的生活情趣遭到了剥夺。成年以后，万历帝作为一个守成之君，历史赋予他的责任是充当天意的庄严象征、道德的最高楷模。这些繁琐的形式和道德的教条愈来愈严重地剥夺了万历帝身而为人的自由天性。如果早年推行的万历新政令他还能感受到作为帝王的责任，那么张居正死后多年，万历帝终于逐渐明白：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特定制度所需要的产物。小说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精神世界里层细处，体察出一个孤独的帝王，对生活的厌倦已经越出了内心世界可以承受的范围。万历帝对既有命运的反抗是对一切朝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特别是在立储问题的表现上。在大臣们的节节进逼下，万历帝不得不妥协；然而他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受损，就设法报复。报复的目的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发泄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那个人，而可能是无辜的第三者们。积多年之经验，万历帝终于发现消极抵抗乃是对付制度最有效的工具，并终其一生实践着他独特的治国原则。从万历帝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无道昏君，而是热情早熟的个性在尚未绽放出生命之光时便遭遇到了体制的压抑，在反抗压抑的过程中又逐渐扭曲异化为偏执和乖戾，最后成为体制的殉葬品。



序

作者选择了既朴素又典雅的历史氛围营造,对明王朝衰亡前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皇宫禁苑、军营重地、厂卫牢狱、酒肆茶楼、戏班欢场、卜卦求神等场面无不透出时代的特征,无不成为事件、行为的铺垫、契机与见证。比如为了渲染明末大厦将倾的气氛,作者先将取景镜头对准内宫禁苑:隆庆帝临终托孤,内宫里外忐忑不安,在外是高拱和张居正不见刀兵的激烈冲突,在内是宦官冯保为了争夺司礼太监这个内宫最高职位的种种行动,而内外两股势力又因为隆庆帝死后短暂的混乱而纠集在一起。在紧张的宫廷政权争夺战中,作者刻意渲染了“山雨欲来”的效果,又为后文更多的宫廷之争作了铺垫。历史本身只是放大的人的存在境况,普遍的历史氛围构成了人存在的境遇,因而氛围的营造对于历史文学至关重要。布劳得曾将“时间”一词分解为三个概念:地质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从地质时间上说,它代表着历史序列中的某一点。作者将其置身于历史嬗变的氛围里,通过“这一个”人物的历史行为来表现晚明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从社会时间上说,人物是文明史中的一个符号。作者有意将人物与风云突变的社会关系相关联,显示人的社会作用。从个人时间上说,人物是复合意志的制造者与受制者;他们以个人的精神力量在创造“人的历史”,却又时时受制于历史与性格的局限性。如果仅是从历史的时间性出发去演绎故事,不注重氛围的营造,不做自然的铺垫,小说就缺乏应有的时代血肉感和质的定性,就成了单纯的历史故事长篇。

《万历五十年》在表现历史人文背景方面是成功的,有些细节写得非常生动。如万历登基、百官朝觐、祭天求雨等大场面中,其仪仗的规模、用具、队列、行进的方式、当时的气氛,描绘得有声有色,有现场感。此外,君臣在朝堂上的对答情形、臣阁办公的状态、内宫的生活细节、各种职官的责任……都通过精微的细节——包括有关的步骤、作法、规程、用品及术语,逼真地表现出来。对时人交往的礼仪范式,也写得细腻传神。虽然岁月阻碍着我们走进古人的日常话语天地,但作者却找到了开门的三把钥匙:直接研读



所写对象的遗著及有关典籍；琢磨并消化笔记、小说、野史中的流行语言；在此基础上，凭着自己的颖悟和直觉去深入体察古人的日常话语。我们看到，小说中人物的日常会话，从官衔、等级、职业、身份、年龄不同者相互称呼的细微差别，到论学谈道、辨析时局、讽议朝政的表达方式和习惯用辞，以及时人的来往信件、唱酬吟对、公文尺牍、奏折圣旨等，作者都加以推敲，用心体验，使之带有时代的特定色彩。

总之，读《万年五十年》就像亲身在晚明的那段历史河流上畅游了一回；而生活在其中的观念和行为方式都与我们不同的古代人物，也一个个活灵活现地向我们走来，讲述着遥远而陌生的故事。凝视明王朝暗红色的踟蹰背影，它时刻提醒着我们该怎样走过今天而进入明天。

吴秀明 尹 凡

（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及其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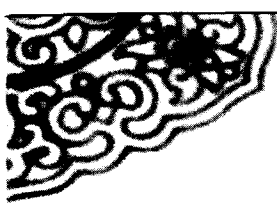
序

人 物 表

- 隆庆帝 (1537—1572) 即朱载堉。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熹第三子,万历帝的父亲,在位六年,庙号穆宗。
- 万历帝 (1563—1620) 即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个皇帝。隆庆六年即位时,年仅十岁,执政长达四十八年,万历是他的年号,死后庙号神宗。他少年早熟,曾支持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明朝得以中兴。成年后,忌重臣之威,憎言官之烦,专宠贵妃郑氏,因皇储“立长”、“立爱”之争,罢朝二十余年不见群臣,但仍牢牢控制着政权。
- 张居正 (1525—1582) 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曾任穆宗讲官,穆宗即位后迁官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辅政。神宗幼年即位,他是顾命大臣之一,高拱被逐后成为首辅,中极殿大学士,逝世前九天领太师衔,这在明代是绝无仅有的。他掌控十年政局,是“万历新政”的设计者和主持者,明朝惟一的大政治家、改革家。死后被抄家,三十六年后,由神宗的儿孙为其平反。
- 冯 保 河北深州人。嘉靖年间入宫为宦官,是万历帝儿时的“大伴”。因与首辅高拱不协,深结张居正。穆宗死后,斥孟冲、逐高拱,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提督东厂,成为大内总管。张居正死后,受宦官张诚、张鲸排挤,被抄家谪为奉御,贬往南京孝陵。
- 高 拱 (1512—1578) 河南新郑人。嘉靖末年入阁,隆庆三



- 戚继光 (1528—1587) 山东登州(今蓬莱)人,一说安徽定远人。明代抗倭名将、出色的军事家。隆庆元年,被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防,军队强盛,京师无扰。张居正死后,南调镇守广东,不久被免职,四年后病逝。
- 海 瑞 (1514—1587) 广东琼山人。嘉靖举人,曾任淳安知县、户部主事等职。因上疏批评世宗迷信道教、不理朝政而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任应天巡抚,因耿直而受排挤。万历十三年再起,任南京右金都御史,两年后病死。
- 申时行 (1535—1614) 苏州人。嘉靖进士,职授修撰,万历六年,任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张居正死后,接任首辅八年,进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为官惟图自保,无所建树,后因议建皇储事,遭谴辞职。
- 徐 阶 (1503—1583) 明代大臣,曾与严嵩共事内阁二十来年,后令人弹劾严嵩,嵩去职后即为首辅,直至穆宗朝被高拱所劾,辞官还故乡松江华亭。其弟仗势侵田害民,被海瑞所拘。
- 王锡爵 (1534—1610) 江苏太仓人。嘉靖进士,掌翰林院,见忤于张居正。万历十二年,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机务,申时行去职后继任首辅,促成皇长子朱常洛出阁读书。因奉诏拟“三王并封疏”,为朝官弹劾,上书乞归。
- 赵应元 户部侍郎,卷入京察风暴后外放湖广巡抚,后由冯保推荐任两广总督领兵部尚书衔。
- 吴时来 浙江仙居人。嘉靖进士,因上书劾严嵩罪,被诬下



狱，廷杖、遣戍烟瘴白横州（属广西）。严氏事发后，回故乡闲居，后召回任顺天府尹，成为“万历新政”的竭力推行者。

邹元标 (1551—1624) 江西吉水人。万历进士，初出仕便因得罪张居正而谪戍都匀卫六年。张死后被召回任谏官，以敢言著称。不但为张居正大发不平之论，还上疏批评万历酒、色、财、气“四病”，再次被罢职，至东林书院讲学。

潘季驯 (1521—1595) 明代水利专家，自嘉靖末至万历年间，治河达二十七年之久。后任工部尚书，因替张居正鸣冤而触犯万历帝，降级为吏部侍郎，因“争国本”及为“三王并封疏”劾王锡爵而去职，回故乡无锡后，在东林书院讲学。

慈圣皇太后 隆庆帝的贵妃，万历帝生母。姓李，宫女出身，但颇有识见，城府也较深，是“万历新政”的主要支持者。

仁圣皇太后 隆庆帝的皇后，万历帝嫡母。体弱而性淡泊，百事不问，与慈圣母子相处甚洽。

郑玉箫 (?—1630) 河北大兴（今北京）人。万历帝宠妃，皇三子朱常洵的生母，是她左右了万历帝的后半生。明末三大奇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中，她都是幕后幕前的主角。

王皇后 浙江余姚人。万历帝皇后，体弱，无子，与仁圣皇太后有颇多相似之处。得慈圣皇太后照拂，她的皇后宝座稳如磐石。

王迎儿 为宫女时，遇万历帝偶然“临幸”，因怀孕而被晋封为才人，生育皇长子朱常洛后，又晋为恭妃。在立储之争中被逼疯。

赵太夫人 张居正的母亲。

王氏 张居正的正妻。



人物表

- | | |
|-----|---|
| 张敬修 | 张居正的长子，进士，尚宝司丞，被参革，死于江陵奇祸。 |
| 张嗣修 | 张居正的次子，进士，锦衣卫千户，被参革，流放广东揭阳。 |
| 花颜容 | 万历年间的当红女伶，张嗣修的红颜知己，死于江陵奇祸。 |
| 毕帘秀 | 万历年间的当红女伶，花颜容的搭档，后与张嗣修结为患难夫妻。 |
| 梁辰鱼 | (约1521—约1594) 江苏昆山人。明代戏曲作家、太学生。昆腔《浣纱记》的作者。 |
| 汤显祖 | (1550—1616) 江西临川人。明代戏曲作家、文学家。曾因拒绝首辅张居正的招揽而落第，至万历十一年才得中进士。昆腔《牡丹亭》的作者。 |
| 徐渭 | (1521—1599) 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文学家。屡试不第，曾为浙闽总督胡宗宪幕僚，胡下狱后，惧株连而发狂。与汤显祖等人在剧作方面有交往。 |
| 李伟 | 慈圣皇太后的继父，赐爵武清侯。 |
| 朱冈 | 明皇室宗亲，袭爵抚宁侯。 |
| 羊可立 | 言官，高拱的亲信，因力劾张居正而升为尚宝司丞。在立储之争中主张“立爱”，投郑贵妃所好，差一点擢为内阁首辅。受贿案发，被罢官。 |
| 次妃 | 已故废辽王的次妃。趁张居正之死，贿赂羊可立，图谋恢复辽王爵禄，是为江陵奇祸点燃引线的人。 |
| 郑国泰 | 郑贵妃的胞兄。先在锦衣卫当差，后成为锦衣卫指挥使。 |
| 张诚 | 宦官。万历帝儿时的玩伴，继冯保之后，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东厂提督。江陵奇祸的主凶，最终被贬至南京孝陵。 |
| 张鲸 | 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副提督，一度在司礼监掌印， |